



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特征、安全风险及治理策略

[文章编号]1001-5558(2025)01-0130-14

●刘瑞平 李建新

摘要：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数据，以多重比较视角，系统描述了我国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变迁的特征，并分析其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的负增长、老龄化加剧等情况的叠加，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导致婚姻挤压，影响社会稳定；外籍人口大量融入西南边疆地区，境内外流动人口活跃，跨国犯罪风险增加；农村地区人口脆弱性高，易产生多重社会风险的累积。为此，应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理解人口安全内涵，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人口精细化治理、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等方面化解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安全风险。

关键词：陆地边疆；人口特征；安全风险；治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250120.006

一、引言

边疆是一个国家边界性的疆域，包括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太空边疆等多种具体形态。陆地边疆是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是国家多样性和立体化边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部分^[1]。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由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九个省区组成，根据功能、地理、经济和人文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双一流专项（编号：2023SYL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24-07-30

[作者简介] 刘瑞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 100038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西北民族研究

2025年第1期(总第130期)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2025.No.1(Total No.130)

等方面的不同,大致可分为西南边疆(包括广西、云南和西藏)、西北边疆(包括新疆和甘肃)、北部边疆(特指内蒙古)和东北边疆(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2]。边疆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对外展示国家形象和人民生活窗口,是确保国土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新时代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既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3]³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4]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5]。边疆人口是戍边、安边、固疆的基础,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的数量、结构的现状和变迁,将引发经济社会风险的深刻变化,对陆地边疆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人口特征的变迁可能对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安全产生积极效应,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本研究聚焦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人口变迁可能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主要解答以下几个问题:我国陆地边疆地区近些年来的人口状况具有怎样的特征和区域差异?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发展趋势如何?人口变迁中存在哪些安全风险?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策略应对安全风险?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以时间和空间为分析视角,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出发,分析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等人口要素变化特征及其与安全的关系,探索当前陆地边疆地区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的治理策略。

二、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特征

(一) 人口数量

我国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增长模式的异质性较强(见表1)。比较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北部边疆、东北边疆和甘肃的人口增速不断下降,并且由正增长转变为负增长,其中黑龙江人口总量减少的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西南边疆的广西的人口由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西南边疆的云南和西藏、西北边疆的新疆二十年间一直保持人口正增长,其中云南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西藏和新疆的人口增长速度加快。2020年以来,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陆地边疆地区仅有广西和新疆保持着微弱的人口正增长态势,其他七个陆地边疆省区均呈现人口减少的趋势,并且人口减少的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口自然增长来看,2023年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陆地边疆地区的广西、西藏和新疆的人口自然正增长,而其他各地区的人口自然负增长,尤其是北部边疆和东北边疆的人口自然负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 陆地边疆地区常住人口规模增长趋势

全国 及陆地 边疆地 区各省 区	人口规模 (万人)				年均增长率 (%)			自然 增长率 (‰)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2023年	2000— 2010年	2010— 2020年	2020— 2023年	2023年
全国	126,743	134,091	141,212	140,967	0.57	0.52	-0.06	-1.48
内蒙古	2,372	2,472	2,403	2,396	0.41	-0.28	-0.10	-2.25
辽宁	4,184	4,375	4,255	4,182	0.45	-0.28	-0.58	-4.96
吉林	2,682	2,747	2,399	2,339	0.24	-1.35	-0.84	-4.07
黑龙江	3,807	3,833	3,171	3,062	0.07	-1.88	-1.16	-5.75
广西	4,751	4,610	5,019	5,027	-0.30	0.85	0.05	1.43
云南	4,241	4,602	4,722	4,673	0.82	0.26	-0.35	-0.07
西藏	258	300	366	365	1.52	2.01	-0.09	8.76
甘肃	2,515	2,560	2,501	2,465	0.18	-0.23	-0.48	-0.04
新疆	1,849	2,185	2,590	2,598	1.68	1.71	0.10	0.7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的全国和分省年度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二) 人口性别结构与年龄结构特征

1. 人口性别结构

基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当前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性别结构(见表2)，结果显示，西南边疆和新疆的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陆地边疆各省区均呈现0~59岁的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现象。男性人口过剩最多的是广西，为213万人；其次是云南，为195万人。从分城乡分性别人口规模来看，除了吉林城镇，其他陆地边疆各省区城镇和农村均呈现男性人口过剩的现象，且农村男性人口过剩规模大于城镇。西南边疆农村的男性人口过剩较为严重，其中广西、云南的农村过剩男性人口均接近150万。从分城乡的人口性别比来看，西藏和新疆的城镇人口性别比高于全国城镇的平均水平，内蒙古、广西、云南的农村人口性别比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整体而言，相比于其他地区，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人口性别失衡更为严重。

从20~39岁的高峰婚龄阶段人口来看，陆地边疆地区仍呈现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的现象，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都接近或高于110。云南过剩男性人口最多，为80万；其次是广西和新疆，分别为60万和41万。分城乡来看，城镇过剩男性人口最多的是新疆，约22万；其次是云南，约11万；其他陆地边疆省区的过剩男性人口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吉林和甘肃与其他陆地边疆各省区不同，城镇人口呈现男性人口少于女性人口的状况，即女性人口相对过剩。陆地边疆

各省区的农村过剩男性人口均多于城镇。城乡差距最大的是云南和广西：云南农村的过剩男性人口为69万，比城镇多58万；广西农村的过剩男性人口为54万，比城镇多48万。从性别比来看，内蒙古、广西和云南农村人口的性别比较高，均在120以上。其中内蒙古农村人口的性别比最高，约为131。

表2 2020年陆地边疆地区分年龄分性别人口状况

分城乡分性别		全国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广西	云南	西藏	甘肃	新疆
0~59岁											
合计	男性(万人)	59,403	997	1,607	940	1,248	2,195	2,106	177	1,060	1,193
	女性(万人)	55,173	932	1,557	913	1,197	1,982	1,911	156	1,016	1,100
	性别比(%)	107.7	107.0	103.2	103.0	104.2	110.7	110.2	113.3	104.3	108.5
城镇	男性(万人)	38,889	688	1,185	596	821	1,205	1,051	65	567	668
	女性(万人)	36,844	668	1,169	599	810	1,141	1,003	56	557	619
	性别比(%)	105.6	103.1	101.3	99.5	101.3	105.6	104.8	116.9	101.8	108.0
农村	男性(万人)	20,514	309	422	343	427	989	1,055	112	493	525
	女性(万人)	18,329	264	387	314	387	841	909	101	459	481
	性别比(%)	111.9	116.8	108.8	109.5	110.2	117.7	116.1	111.3	107.4	109.1
20~39岁											
合计	男性(万人)	20,264	337	535	300	395	667	703	70	330	419
	女性(万人)	18,731	311	513	290	375	607	623	59	325	378
	性别比(%)	108.2	108.2	104.2	103.1	105.2	109.9	112.8	117.8	101.7	110.8
城镇	男性(万人)	14,196	247	423	208	273	393	375	28	193	240
	女性(万人)	13,619	243	417	211	271	387	364	24	202	218
	性别比(%)	104.2	101.8	101.3	98.4	100.7	101.4	103.0	118.7	95.7	109.9
农村	男性(万人)	6,068	90	112	92	122	274	328	41	137	179
	女性(万人)	5,111	68	96	79	104	220	259	35	123	160
	性别比(%)	118.7	131.0	116.7	115.9	116.9	124.7	126.7	117.3	111.6	112.0

数据来源：通过2000年的“五普”、2010年的“六普”和2020年的“七普”的汇总人口数据计算所得。如无特殊说明，下文同。

2. 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呈现较大的时间进程差异和城乡差异（见表3）。全国和陆地边疆地区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老龄化速度也快于城镇，并且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其中2020年辽宁的农村地区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000年，全国城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低于7%，并未进入老龄化社会，陆地边疆大部分地区的城镇老年人口占比低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但辽宁城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已经超过7%，成为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陆地边疆省区。相比于城

镇,全国农村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更早。2000年,全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7%,而辽宁和广西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又高于全国农村,其他陆地边疆省区的农村地区未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东北边疆城镇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老年抚养比高于全国城镇,辽宁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老年抚养比、吉林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农村,其他边疆省区的老龄化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2000—2020年二十年间的变化趋势来看,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北边疆的甘肃的城镇和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南边疆、西北边疆的新疆的城镇和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抚养比速度相对较慢。

表3 2000—2020年陆地边疆地区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

城乡	类别	年份	全国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广西	云南	西藏	甘肃	新疆
城镇	65岁+	2000年	6.4	5.0	8.0	6.2	6.0	6.2	5.6	3.1	5.0	4.6
		2010年	7.8	7.1	10.3	8.9	9.1	7.5	7.2	3.5	7.4	7.7
		2020年	11.1	10.9	15.6	14.0	14.8	9.7	9.4	4.8	10.0	8.3
	老年抚养比	2000年	8.5	6.6	10.4	8.0	7.9	8.5	7.4	4.1	6.6	6.1
		2010年	10.0	9.0	12.9	11.1	11.4	10.1	9.4	4.3	9.5	10.1
		2020年	15.6	14.7	21.5	19.0	19.8	14.1	12.9	6.1	14.2	11.2
农村	65岁+	2000年	7.5	5.9	7.8	5.9	5.0	7.8	6.3	5.1	5.3	4.8
		2010年	10.1	8.2	10.3	7.8	7.2	10.4	7.9	5.6	8.7	5.6
		2020年	17.7	17.6	22.0	18.3	17.2	15.2	12.1	6.2	15.4	7.1
	老年抚养比	2000年	14.2	10.5	13.6	9.9	9.1	15.9	11.3	8.3	12.2	7.9
		2010年	14.2	10.5	13.6	9.9	9.1	15.9	11.3	8.3	12.2	7.9
		2020年	28.1	24.8	32.4	25.8	23.6	25.7	18.2	9.5	23.6	10.9

(三) 人口流动特征

1. 陆地边疆地区的大陆流动人口

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流动主要以省区内人口流动为主,且流动趋势不断增强,跨省区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表4显示,2000—2020年,东北边疆、西南边疆(除西藏外)和西北边疆省区内流动人口比例大致呈现上升趋势,跨省区流动人口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00—2010年,内蒙古和西藏的跨省区流动人口比例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但2010—2020年呈现快速下降态势。2020年,相比于其他陆地边疆省区,辽宁、云南、西藏和新疆的跨省区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已有研究发现,各民族的人口流动愈加活跃,人口流动使各民族人口的省际空间分布更加均匀,这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空间互嵌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6]。

表4 2000—2020年陆地边疆地区省区内、跨省区流动人口占比变化(%)

全国 及陆地边 疆地区各 省区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省区内流动 人口占比	跨省区流动 人口占比	省区内流动 人口占比	跨省区流动 人口占比	省区内流动 人口占比	跨省区流动 人口占比
全国	61.1	38.9	61.1	38.9	66.8	33.2
内蒙古	81.4	18.6	76.4	23.6	81.4	18.6
辽宁	68.9	31.1	71.8	28.2	71.5	28.5
吉林	83.8	16.2	85.5	14.5	87.4	12.6
黑龙江	84.9	15.1	88.0	12.0	90.2	9.8
广西	83.7	16.3	84.9	15.1	85.7	14.3
云南	64.4	35.6	77.8	22.2	79.0	21.0
西藏	42.6	57.4	36.8	63.2	60.5	39.5
甘肃	80.6	19.4	83.3	16.7	85.7	14.3
新疆	46.7	53.3	55.1	44.9	57.9	42.1

2. 陆地边疆地区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口

表5展示了2010年以来居住在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口的状况。从表中可见,2010—2020年,陆地边疆地区的港澳台居民不断增加,但基本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10年,陆地边疆各省区的港澳台居民中最多的是台湾居民;而到了2020年,香港居民多于台湾居民。从外籍人口来看,2010—2020年,内蒙古、辽宁、黑龙江、西藏和新疆的外籍人口呈现减少趋势,而吉林、广西、云南、甘肃的外籍人口呈现增加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十年间,主要来自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外籍人口大规模涌入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①。云南的外籍人口由2010年的约4.58万,增长到2020年的约37.67万,十年间增长了约33万,年均增长率高达23.5%;云南的外籍人口占全国外籍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7.7%增长到2020年的44.5%。

表5 2010—2020年陆地边疆地区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口规模(人)

年份	类型	全国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广西	云南	西藏	甘肃	新疆
2010年	合计	1,020,145	2,979	23,834	6,034	6,894	23,445	47,396	574	978	3,745
	香港	234,829	48	390	43	89	824	583	1	29	67
	澳门	21,201	4	41	8	5	60	22	0	0	2
	台湾	170,283	58	680	65	86	1,096	990	0	37	65
	外籍	593,832	2,869	22,723	5,918	6,714	21,465	45,801	573	912	3,611

① 本研究还使用“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大陆较多的外籍人口的国籍分布,结果显示,来自缅甸、越南的外籍人口大幅度增加,其中缅甸人口十年间增长了约31万。

续表

年份	类型	全国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广西	云南	西藏	甘肃	新疆
2020年	合计	1,430,695	1,717	20,562	6,790	3,153	26,043	379,281	405	1,373	1,327
	香港	371,380	211	921	333	354	1,929	1,294	1	105	176
	澳门	55,732	12	106	56	39	189	332	1	12	22
	台湾	157,886	89	797	181	137	1,347	966	1	55	99
	外籍	845,697	1,405	18,738	6,220	2,623	22,578	376,689	402	1,201	1,030

(四) 婚姻结构特征

表6展示了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婚姻结构状况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从未婚人口状况来看,陆地边疆各省区农村男性和女性未婚人口的比例均低于城镇,西藏、云南、广西和新疆的城镇和农村的男性和女性未婚人口比例相应要高于其他省区,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有配偶状况来看,除了西藏,其他陆地边疆省区的农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有配偶的比例高于城镇,但与城镇不同,农村女性人口有配偶的比例均高于男性人口。从离婚状况看,除了西藏和甘肃,其他陆地边疆省区的农村男性人口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高于城镇,但陆地边疆各省区的农村女性人口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低于城镇女性人口。从丧偶状况来看,除了黑龙江和新疆,其他陆地边疆省区的农村男性人口丧偶的比例均高于城镇男性人口,所有陆地边疆省区的农村女性人口的丧偶比例皆高于城镇女性人口。女性人口丧偶比例高于男性人口主要是因为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人口,并且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低于城镇人口,导致农村女性人口丧偶比例最高。总体而言,相比于陆地边疆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人口未婚、有配偶、离婚和丧偶的性别差异更大。

表6 2020年陆地边疆地区分城乡分性别人口婚姻状况(%)

全国及陆地边疆地区各省区	未婚		有配偶		离婚		丧偶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城镇人口								
全国	24.0	18.2	71.5	72.2	2.1	6.7	2.5	2.8
内蒙古	19.0	14.7	75.8	74.2	2.1	7.7	3.1	3.4
辽宁	19.6	14.7	72.8	70.6	3.0	9.2	4.7	5.5
吉林	19.2	14.8	72.9	69.8	2.9	9.6	5.0	5.8
黑龙江	20.0	15.8	71.4	69.2	3.2	9.3	5.4	5.7
广西	28.5	21.3	67.1	68.3	2.1	7.8	2.3	2.6
云南	27.2	21.5	67.7	68.5	2.1	6.7	3.0	3.2
西藏	34.8	31.7	61.9	60.9	1.4	4.6	1.8	2.8

续表

全国及陆地边疆 地区各省区	未婚		有配偶		离婚		丧偶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甘肃	21.7	17.0	73.4	73.0	2.5	7.5	2.4	2.5
新疆	24.1	18.0	70.4	69.6	1.8	7.6	3.7	4.8
农村人口								
全国	20.2	11.3	72.5	75.8	2.6	1.1	4.6	11.8
内蒙古	15.3	7.6	77.4	79.8	3.3	1.3	4.0	11.2
辽宁	16.1	8.9	74.8	77.5	3.8	1.7	5.3	11.9
吉林	14.5	9.1	76.0	78.1	4.2	1.8	5.3	10.9
黑龙江	15.8	10.8	75.0	76.7	4.5	2.3	4.8	10.2
广西	25.0	11.5	67.8	73.1	2.3	0.7	4.9	14.8
云南	25.1	13.8	68.2	73.9	2.9	1.4	3.8	11.0
西藏	34.5	27.5	60.7	61.1	1.3	2.7	3.4	8.7
甘肃	19.0	10.9	73.7	76.6	2.1	0.7	5.2	11.8
新疆	23.2	14.4	70.7	73.6	3.7	2.9	2.4	9.0

三、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变迁中的安全风险

(一) 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叠加，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陆地边疆已有七个省区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尤其是东北三省成为全国人口负增长最为严重的地区，未来该地区人口减少的速度最快^[7]。人口负增长主要是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严重的老龄化和人口流失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出生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多，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再加上人口流失的负作用，强化了人口负增长的动力。人口负增长引起人口总量减少和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社会总消费、储蓄和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8]。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叠加成为我国21世纪的新常态，陆地边疆地区应对人口安全风险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全国低生育水平背景下，各地区制定各式各样吸引人才的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人才的拉力将进一步导致陆地边疆地区的人才外流，从而更加不利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低生育水平和人口流失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城市萎缩和乡村“空心化”。城市萎缩已经成为东北边疆最普遍的现象^[9]，也成为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对稳定戍边产生不利影响^[10]。严重老龄化将带来疾病扩张风险积聚、劳动参与率下降和经济生产活力弱化、老年贫困风险累积、政府债务风险攀升等重大社会风险^[11]。人口是屯垦戍边与发展的基础，持续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流失将导致边疆人口安全缺乏数量和质量保障，弱化边疆地区的安全管理，不利于人口发展和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2]。边疆人口大量外流会导致抵边村寨“虚空”、境内耕地闲置抛荒,诱发邻国边民过耕过牧等现象,长此以往易诱发领土权属与土地纠纷,给领土主权安全带来隐患^[13]。

(二) 长期人口性别比失衡,影响社会稳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男性人口过剩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14];陆地边疆地区人口性别比同样处于长期失衡状态,农村人口性别比远高于城镇,过剩男性人口规模更大。从上文的婚姻结构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和农村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高于女性,而农村未婚人口的性别差异大于城镇,这说明陆地边疆地区的农村婚姻挤压程度高于城镇。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破坏家庭的稳定性。因为大龄未婚男性人口会尽可能寻找婚姻机会,从而可能导致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现象发生,增加离婚风险,而家庭遭破坏与暴力犯罪风险密切相关^[15]。单身男性人口的婚姻匹配压力,导致不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刺激骗婚、买婚案件多发,引发社会问题和违法犯罪事件,扰乱正常的婚姻市场和社会治安秩序^[16-17]。陆地边疆地区长期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使得越来越多的大龄未婚男性人口缺少与之婚配的适龄女性人口,他们可能会在邻国寻求婚姻机会。在跨国婚姻家庭中,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由于语言障碍、生活习惯差异、感情基础薄弱等原因,婚姻关系不一定稳定牢靠,易产生婚姻家庭纠纷,影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18-19]。研究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其跨国婚姻家庭成员身份,勾结境内外犯罪团伙,从事贩卖人口、走私、贩毒等犯罪行为,增加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数量,引发社会治安和边境安全问题,给我国边境治安管理带来极大困难^[20]。

(三) 境内外流动人口活跃,跨国犯罪风险增加

近十年来,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的外籍人口大幅度增加,尤其是西南边疆及其邻省涌进较多的来自缅甸和越南的外籍人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传统跨国犯罪和新型跨国犯罪交织,从而给陆地边疆安全治理带来更大挑战。西南边疆多是民族地区,大规模的外籍人口涌入使人口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涉及民族人口、流动人口、非法出入境人口等多种类型的人口。这使西南边疆更可能成为境外势力重点渗透的区域,成为跨国犯罪问题滋生的土壤^[21]。研究发现,“三非”人员往往与走私(走私野生动物、毒品、枪械等)、抢劫偷盗、卖淫等违法犯罪案件相关联^[22]。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和传播,成为恐怖主义组织招募人员和募集资金的重要工具。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的网络信息安全也越来越突显,电信诈骗、网络色情、欺诈性转账和网络赌博是主要的网络犯罪形式^[23]。2020年,云南边检总站查破毒品案件1,794起,缴获毒品11.913吨、易制毒化学品599.46吨;查获走私案件5,943起,案值3.72亿元;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9.6万人,打击处理“四黑”人员2,208人,打掉有组织犯罪团伙113个,拔掉境外“钉子”14个;

收缴各类枪支3,109支、子弹3.7万余发;拦截查堵涉嫌跨境赌博、电信诈骗人员1.77万人^[24]。

(四) 陆地边疆地区农村人口脆弱性高, 多重社会风险累积

从2000年以来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变迁特征来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出现许多新的人口形态, 如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流动人口、外籍人口以及跨国婚姻人群等; 这些群体抵抗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更弱, 脆弱性更高, 这给陆地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相比于城镇, 大多数陆地边疆地区的农村人口性别比更高, 尤其是20~39岁高峰婚龄阶段人口, 农村过剩男性人口更多, 农村的婚姻挤压程度高于城镇。由于陆地边疆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农村男性人口在婚姻市场上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从年龄结构来看, 陆地边疆地区的老龄化城乡倒置, 即农村老龄化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镇, 农村将面临更高的老龄化社会风险。值得注意的是, 陆地边疆地区的农村女性人口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人口, 在高龄时期, 女性人口陷入丧偶状态的风险更高。前述数据结果显示, 陆地边疆地区的女性人口丧偶比例远高于男性人口。农村丧偶老年女性人口成为最弱势、最边缘的群体之一, 更容易陷入贫困^[25]。尤其是在陆地边疆地区, 在当前我国农村养老、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背景下, 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最为主要的养老方式, 但农村青壮年流失严重, 丧偶老年女性人口的生活状况、养老、健康等各方面将会面临更多困难。

四、陆地边疆地区人口安全风险的治理策略

(一)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深刻理解人口安全的内涵

人口安全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范畴, 但它既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影响, 也可能对传统安全领域产生影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框架中, 人口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人口要素与外部环境的非均衡性, 既影响自身的发展, 也直接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威胁民族的长期生存能力。人口安全与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各领域的安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共同构成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人口安全风险治理应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正确理解人口安全的内涵, 坚持人口数量安全与人口结构安全相统一的原则。人口数量安全和人口结构安全相统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既要重视人口数量安全, 也要重视人口结构安全, 可能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任务有所侧重, 而人口结构安全将是新时代人口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陆地边疆地区面临着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内部人口流失、外籍人口大规模涌入等人口结构自身安全问题, 并且人口内部结构安全风险可能会诱发社会安全、经济安全、边防安全等其他安全风险。第二个方面是人口数量安全与人口结构安全相辅相成。人口

数量安全与人口结构安全是相互作用的,例如东北边疆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是全国最为严重的,人口减少,经济活力下降,经济发展不景气,青壮年人口流失严重,进一步加剧和加速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政府财政困难等社会经济风险增加,人口持续流失。

(二) 推动陆地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人口吸引力

经济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础,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等快速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流动迁移更加活跃,人口的聚集作用更加突显,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更加严重。而陆地边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在这种人口浪潮中必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陆地边疆地区虽然面临人口安全风险与挑战,但同时恰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国家战略机遇期。我国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加大相关优惠政策向陆地边疆地区倾斜的力度,促进陆地边疆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第一,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进边疆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陆地边疆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26],加大人才支持力度,通过住房、教育、税收、就业、社会保障服务等全方位多领域各方面的优惠政策,留住边疆人才,引进紧缺人才。第二,加大对陆地边疆地区的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生存发展环境,发展边疆特色旅游业,打造、拓宽贸易产业链,推动陆地边疆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陆地边疆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加强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与陆地边疆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引导内地企业投资边疆地区,加大对口援助的力度和精准度,帮扶陆地边疆地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和薄弱环节。

(三) 提升教育发展水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陆地边疆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一波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陆地边疆地区的人口变迁呈现新特点、新趋势,其所造成的连锁反应更为复杂、广泛、深远。我国陆地边疆地区生育水平下降、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流失严重,来自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外籍人口大量涌入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跨国婚姻普遍存在。然而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容易使陆地边疆地区的外籍人口融入困难,尤其是语言障碍影响各民族更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语言是直接沟通的桥梁,是文化的根基,语言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因此,首先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教育融入各层次教育阶段和各类人群,对长期定居的外籍人口、各民族人口开展国情与文化教育、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教育。其次,促进民族地区的教育结构优化改革,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切实提升教师素质,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27]。最后,加强法治教育。陆

地边疆地区的跨境人口流动、国际贸易与走私、贩毒等犯罪相关联,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维护边疆安全稳定是全社会的责任。社会参与要从教育抓起,加强法治意识教育,增强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各民族人口的法治意识和素质。人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社会才能安定有序。

(四) 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加强人口精细化、精准化治理

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结构复杂,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交织,更易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之地,人口安全治理压力大、难度高。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人口安全风险预测预警机制是重中之重。利用人防物防技防的综合手段,摸清陆地边疆地区人口的基本状况,掌握人口动态流向,健全人口安全风险预测预警系统,对人口安全风险及时预知、精准预警和快速反应处置,从源头上消除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加快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扩大公共区域视频系统覆盖面,做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部位、易发案事件点位的视频全覆盖,尤其是边境管理区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的视频全覆盖;加强危险物品管理,对异常行为、异常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测预警。依托人口安全风险预测预警机制,加强人口精细化、精准化治理。完善陆地边疆地区各部门以及与其他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联合协调机制,推动人口治理信息互联、整合与共享,重点挖掘人口信息大数据库,建立人口信息分析研判与实战应用的有效链接,为陆地边疆地区人口治理提供大数据支撑。全面了解管辖区域、不同行业领域的人口特征,细化不同类别人口的区分,剥离出重点管理和服务对象,尤其是要加强对困难人群的帮扶工作,对特殊人群采用安全风险评估和分级管控制度,提供精准化的公共服务。

(五) 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深化人口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共同行动,为各领域国际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等,是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是我国全球安全倡议与行动的重要平台和机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型犯罪行为更加隐蔽,新型犯罪不断迭代更新,安全风险扩散跨领域、跨区域、跨国界,其破坏力更大,仅靠一个国家或地区单方面的打击难以取得根本性的成效,安全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和专项联合行动势在必行。不断推进我国移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完善移民服务管理政策和法律制度规范,加强出入境服务管理和安全防范,严厉打击妨害陆地边境管理的违法犯罪活动,综合治理“三非”人员问题。通过加快边境地区出入境治理和外籍流动人口治理的立法进程,加强外籍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机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建设,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与周边国家等治理主体的能动作用等,多维度治理边境地区外籍流动人口^[28]。在人口性别失衡、跨国婚姻管理与服务、人口流动、老龄化等人口议题方面,全面加强周边国家的安全治理合

作;深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开展联合专项行动,打击跨国跨境人口拐卖、毒品走私、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活动。

参考文献:

- [1] 周平.陆地边疆: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J].新视野,2017(5).
- [2] 李庚伦.中国陆地边疆:演变、界定及分类[J].广西社会科学,2019(5).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4-07-19(1).
- [5]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EB/OL].(2023-05-05)[2024-05-25].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05/content_5754275.htm.
- [6] 黄凡,段成荣.人口流动与民族空间互嵌格局的发展演化——基于第三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22(6).
- [7] 李建新,刘瑞平.我国省际人口负增长趋势的差异性分析[J].人口学刊,2020(6).
- [8] 柳如眉,刘淑娜,柳清瑞.人口变动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1(5).
- [9] LI H, MYKHENKO V. Urban Shrinkag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8(4).
- [10] 王焱.人口流失、城市收缩与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困境[J].百色学院学报,2021(3).
- [11] 陆杰华,傅崇辉.关于我国人口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4(3).
- [12] 段成荣,盛丹阳,刘涛.人口流动对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的影响及机制分析[J].人文地理,2022(4).
- [13] 尤伟琼.我国西南陆地边境的虚空态势及其治理思考[J].思想战线,2019(3).
- [14] 张震,马茜.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前景与对策[J].人口研究,2022(1).
- [15] MESSNER S F, SAMPSON R J. The Sex Ratio, Family Disruption, and Rates of Violent Crime: The Paradox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J]. *Social Forces*, 1991(3).
- [16] 靳小怡,郭秋菊,刘利鸽,等.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J].青年研究,2010(5).
- [17] 尚子娟,刘泽.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挤压问题的治理研究——基于“越南新娘”现象的思考[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 [18] 李娟,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J].南方人口,2008(1).
- [19] 覃晚萍.中越跨国婚姻纠纷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5(9).
- [20] 于楣,高延芳.试析中缅边境跨国婚姻贫困循环因果的破解——以德宏州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9(5).
- [21] 青觉.长治久安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3).
- [22] 沈茂英,李梦鹤.改革开放以来边疆人口问题研究文献评述——以新疆云南为重点[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

- [23] 李志斐.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 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1 (1).
- [24] 云南日报. 云南边检总站战疫情防风险保稳定交出优异答卷 [EB/OL]. (2021-02-07) [2024-05-23]. https://www.yn.gov.cn/ztgg/yqfk/lflk/202102/t20210207_216732.html.
- [25] 王晶, 刘彦喆. 影响农村丧偶老年女性贫困的家庭因素探析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 (3).
- [26] 青觉, 王敏. 边疆民族地区融入国家新发展格局的生成逻辑、面临挑战与路径取向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5).
- [27] 袁同凯, 朱筱煦. 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
- [28] 郭天一. 云南边境地区外籍流动人口治理的多维度思考 [J]. 思想战线, 2021 (2).

(责任编辑: 王国军; 专业编辑: 简 洁)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Security Risk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Land Frontier Regions of China

LIU Ruiping LI Jianx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ree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from 2000 to 2020,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changes in frontier regions from multip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nd analyzes th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it may bring. The combination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worsening aging in frontier region restric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long-term imbalance of sex ratio in the population has led to marriage pressure and affected social stability. The influx of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ers into the southwest border region has led to acti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igration, increasing the risk of transnational crime. The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is highly vulnerable and pron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multiple social risks.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firmly establish 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population securit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address population security risks in land border areas 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rengthening refined population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security work.

Keywords: Frontier Regions;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Safety Risks; Governance Strategy